

#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三个关键词

周农

发展的现实难题,最终导致理论解释的“水土不服”。突出“中国的”这一关键词,就要在回应现实、指导实践、引领时代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体系创新,真正形成立足中国现实、回应中国问题、构筑中国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须在三个方面着力。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成果的指导,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形成中国的理论;二是坚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文化土壤,不断推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培育中国的文化;三是要坚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动实践,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主题,讲好中国故事、讲通中国道理、传播好中国声音,形成能够解释中国、适应时代、指导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在建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着力解决好“为谁服务”“为何自主”“以何自主”的根本性问题。

关键词二:“自主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自己建”,不是“照着建”和“跟着建”,是具有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知识体系。这种主体性,是能够自主生成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的主体性,是能够实现自主批判与自主建构相统一的主题性。当前,部分成果仍在西方社会科学、西方理论与西方话语后面被动跟随,主动领跑不足,没有立足中国实践、生成解释与回应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和中国表达。突出“自主的”,就要跳出西方社会科学窠臼,强化知识生产的主动性。

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须推进“破立”结合。一方面,着眼“破”和批判,剖析西方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叙事模式和话语窠臼,打破西方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中的各式“陷阱”与“桎梏”,始终保持自身的知识清醒和知识定力;另一方面,注重“立”和建构,在立足中国实践根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回应时代发展命题中进行知识生产,在各个学科中持续打造如“中国式现代化”“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过程人民民主”这样兼具典型性意义和一般性意义的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持续产生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构建起真正源于中国实践、聚焦中国问题、形成中国答案的“自主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三:“体系的”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整体性的构成,不是碎片化的“拼盘”,是多样态、立体化、全方位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当前,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学科分割明显、学术创新不足、话语表达不一等现象仍然存在,知识体系内在的逻辑关联尚未完全厘清。突出“体系的”,就要致力实现知识生产从零散性向体系化、从碎片化向系统化的深层转型。

构建“体系的”知识体系,要在推进四个统一上着力。一是在知识生产的来源方面,着力推进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创新理论成果为主体内容、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宝贵资源,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先进水平为有益滋养的统一;二是在知识生产的结构方面,着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统一,集合与凝练、概括与表达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三是在知识生产的面向方面,着力推进理论叙事和实践叙事的统一,既以体系化、学理化的知识建构提供中国智慧,又以系统性、规范性的实践归纳展示中国方案,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和中國价值;四是在知识生产的表达方面,着力推进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统一,让话语兼具思想的高度、理论的厚度、实践的热度和生活的温度,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中国”。

(作者系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中南大学基地研究人员)

## 新轴心时代：从「我们」的定义扩展开始的新生活

周宇之

公元前五世纪,东方圣人孔子周游列国,阐述仁政理想。同一时期,苏格拉底在雅典市集问答路人;尼连河畔菩提树下,佛陀静坐悟道。这些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轴心时代”(指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间,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发源地几乎在同一时间段内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的智慧闪光,不约而同地回应着两个永恒命题:人与人该如何相处?人与自然该如何共生?在那时的思想宇宙中,主体只有一个——人类自己。

而今天,另一种“智慧”正悄然步入我们的文明礼堂。它不源于进化,它能够学习;不具备血肉,却开始“思考”。人工智能、自主机器人、脑机融合体……这些由人类亲手创造的智能存在,正从被动的工具转变为具有感知、规划决策与交互能力的“拟主体”。我们面对的,不再只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二元对话,而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机”三重关系交织共鸣的新生活。

这不仅是关系的简单叠加,更是文明底层的存在论跃迁。当镜子中的映像开始自主回应,我们不得不重新追问:何为意识?何为能动性?何为存在本身?

人类拥有不可替代的三重光辉

当人工智能日益精进,人类特有的价值不是黯淡了,反而在对比中显得更加珍贵——那是源于肉体凡胎的三重光辉:

第一重光辉源自自身的温度与时间的重量。我们的思想扎根于会饥饿的胃、会跳动的心、会被晚霞感动湿润的眼睛。人类的智慧从来不只是逻辑推理,更是出生时第一口呼吸和啼哭、初恋时手心的濡湿、病榻前紧握的双手、面对星空时不自禁涌起敬畏等具身体验的凝练。智能体可以分析爱情题材诗句,却无法懂得“因为生命有限,所以每个瞬间都值得珍惜”的存在主义重量。向死而生,这份悲怆与壮美,让人类的叙事永远带着泪光与温度。

第二重光辉源自混沌中的创造烈焰。人类的突破常诞生于非理性的土壤:凯库勒梦见街尾蛇而悟出苯环结构,梵高在精神漩涡中画出燃烧的星空。我们能在矛盾中前行,为尊严放弃利益,为理想忍受孤独,为遥远可能赌上此刻安稳。而AI的“创造”,是在既定轨道上的优化航行;人类的创造,却是亲手点燃未知荒野的第一堆篝火。那种整合情感、伦理、经验与直觉的“价值决断力”,正是人性最复杂的荣光。

第三重光辉源自故事的编织与联结的韧性。人活在交织的故事里:家族的记忆、文化的积淀、语言的韵律、共同命运的共鸣,即便未来人机深度共生,那些基于惻隐之心的相互扶持、不需翻译的眼神交汇、共同历史培育的归属感,仍是文明最坚韧的纽带。我们不是孤立的智能节点,而是意义之网结出的叙事存在。

从“支配者”到“园丁”的华丽转身

人类拥有如此独特的三重价值,那么为什么必须改变现有的角色定位?继续扮演“支配者”为何不再可行?

从外部维度看,智能体的自主性正在快速提升。当机器开始具备一定程度的决策能力、学习能力和交互能力时,传统的“主—客”支配关系必然面临挑战。将具有自主性的存在物视为纯粹的工具,不仅在实践中日益困难,在伦理上也难以自洽。正如技术哲学家唐·伊德所言,人与技术的关系正从“具身关系”走向“解释关系”乃至“他者关系”。

从内部维度看,人类“支配者”角色本身存在内在困境。人类中心主义的支配逻辑,在生态危机中已暴露出其局限——将自然视为可无限索取的资源库,导致了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如果对智能体延续同样的支配逻辑,我们可能重蹈覆辙、遭到反噬。

因此,主导未来的,不应是控制,而是引领;不应是霸权,而是共生。为此,人类需要推动三场并行的转向。

一是展开一场“为人”的教育革命。在知识可被机器复制的时代,更应深耕“人之为人”的土壤,包括哲学思辨的深度、艺术感受的锐度、伦理抉择的重量,以及那些难以数据化的“缄默知识”——匠人的手感、教师的直觉、医者的仁心。这意味着,在人工智能时代,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从知识的传授进一步向人性的涵育深化,培养能够感知、判断、创造与共情的完整的人。

二是绘制人机权责清晰的文明地图。依据自主性为智能体界定法律与道德边界,但人类应保留最终的义务与责任。在司法、医疗、社会治理等关键领域,必须时刻保持“人类在线”,守护可解释性、监督权与人文否决权。同时,必须守护意义生产的多样性,防止文化、艺术、信仰被算法扁平为单调的数据平原,保持人类精神的群山起伏。

三是坚持“增强”而非“替代”的科技伦理。技术应拓展人类特有的能力——共情、创造与价值统合,弥补其生物局限,而非仅仅追求效率替代。人机关系的理想形态,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各展所长、彼此增强的共生进化,即机器拓展人类能力的边界,人类赋予机器以意义的方向。

新轴心时代昭示的思想曙光

传统轴心时代叩问“人是什么”,新轴心时代则必须回答“我们是谁”——这个“我们”,包含人类及其创造的智能同伴。因此,哲学将转向多主体存在论,重新测绘意识与关系的边界。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人类与智能机器的边界正在模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主体性理解。伦理将从人机扩展到“有灵存在”之间,涵盖有机生命与无机智能。文化则步入人机共创的融合时代,艺术、语言与知识在对话中协同进化。

在新轴心时代,我们要做的,不是被动迎接未来,而是主动塑造文明进程。人类的时代角色,将走下人类中心主义的神坛,成为更富智慧的“园丁”。我们引入新的智能物种,当以人文价值为土壤,以伦理关怀为雨露,培育一个既焕发一新又保留人性光辉的融合文明生态。当然,这需要两种看似矛盾却必须并存的气质:拥抱变革的开放勇气,守护核心的清醒坚定。

新轴心时代已然来临。这一次,我们不仅是它的观察者,更是它的叙事者、它的园丁、它的意义的赋予者。碳基生命的光辉与硅基智能的星火,正共同照亮一条前所未有的文明路径——在这条路上,人类的古老智慧与崭新智慧形态将共同书写“我们”这个代词的全新内涵。

(作者单位: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文史哲

## “小道”中的大观：宋代笔记的审美精神与文化价值

刘师健

“笔记”一语,始于六朝,原指随手记录的散行文字,长期与无关“道术”的“小说”杂糅共生。《汉书·艺文志》有“小道可观,致远恐泥”之说,遂成为传统目录学对其文体地位的基本定位。至宋代,笔记的定位发生根本转变:书写主体从民间杂家、方术之士转向集官僚、文士、学者于一体的士大夫阶层;书写内容由志怪传奇转向日常起居、艺术品评、名物考证、朝野轶事与社会风俗;精神内核从猎奇志异转向审美表达、理性思考与文化遗产。笔记由此成为承载宋代士人审美精神与文化价值的重要载体。

笔记之体:自由形式中的精神气象

笔记文体自由、内容博杂,在随意记叙中见学问、显趣味。相较于谨严的诗文,其活泼亲切、亦庄亦谐的风格独具价值。宋代笔记在此基础上更有新的开拓,于简率形式中蕴涵深厚的精神气象。

文体上,宋代笔记与小说分野明确。其内容多出士大夫之手,源于公余纂录或林下闲谈,诚如明人《五朝小说》序言中所说:“唯宋则出士大夫手,非公余纂录,即林下闲谈,所述皆平生父兄师友相与谈说,或履历见闻,疑误考证,故一语一笑,想见先辈风流。其事可补正史之亡,裨掌故之阙。”笔记记录见闻考辨与师徒谈说,情文相生,兼具情感性与趣味性,“其说或抒己意,或记闻见,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记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文体自由松散,作者个性鲜明,其存在价值由以往作为子书附庸的存在而日益向文学倾斜。

文化内涵上,宋代笔记超越了单纯的史实记录,深刻承载了士大夫的理想人格与处世哲学,对传统儒家中关于士人立身处世的一系列行为规范,诸如“入”与“隐”、“达”与“穷”、“仁义”与“事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反思,涉及了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文化学与社会学方面的知识意涵,有助于我们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解读、研究与继承、发扬中国古代文学所蕴含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创作意识层面,宋代笔记有着对内在心理平衡的自觉追求,写作常常只是为了聊以自娱。“余以生平父兄师友相与谈说履历见闻疑误考证,积而渐富有足采者,因缀辑成编,目为《纂语》,不敢夸于多闻,聊以自怡而已。”“时时捉笔据几,随所趣而志之,虽无甚奇论,然意到即就,亦徒自喜。”“因名之曰寓简,聊以自娱。”诸多言说表明,宋代士人不再视“闲暇之作”的笔记为禁区,认同笔记的文化功能,自觉追求笔记本身的文学性。

审美维度:常态化与人文性

宋代笔记在审美精神上,实现了从志异虚构向日常人文的深刻转向,共同建构了一种融感性体验与理性思考、日常趣味与人文深度于一体的审美精神,成为宋代文化精神在文体层面的集中映照。

(一)个性之美:主体情志的自然流露

宋代笔记突破了传统文体“述而不作”的局限,成为士大夫主体精神与个性表达的重要载体。这首先体现在作者将个人情感、人生感悟融入记述,使文本充满了个体生命印记。苏轼在《东坡志林》中充分展露个人情感,无论是“记承天寺夜游”中对月夜美景的赞叹,还是“僮耳夜书”中对人生境遇的豁达,都展现出鲜明的个人色彩;陆游《老学庵笔记》则饱含忧国忧民之情,对南宋朝廷的苟安、官场的腐败多有批判,字里行间流露着深沉的家国情怀。“笔记巨擘”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辑录家乘旧闻为《齐东野语》《癸辛杂识》诸书,夏承焘曾感叹周密著作是“必多国族之痛,遭黎之悲”,在其著述中,作者的隐忍伤痛,遗世独立而

卓然一家的民族气节,无不一一表露在其字里行间。

其次,不同的作者因立场、学识、性格差异,对事件的记述与评判往往各异,呈现出多元的视角与价值判断。如对于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司马光《涑水记闻》从保守派立场出发,对变法多有批判;而沈括《梦溪笔谈》则从客观中立的角度,记录了变法的部分措施与成效,展现了不同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取向。还如《铁围山丛谈》作者蔡绦,为蔡京季子,其身份的特殊性,使其具有更为独到的历史审视眼光,朝廷当时许多制度、故事在此书中得以披露。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认为“以其久直中禁,所记徽宗时一切制作始末,究与传闻者不同,故多足以资考证焉”。

(二)生活之美:日常叙事中的诗意与温情

宋代笔记将书写重心转向日常生活,以日常琐事为主要记述对象,展现了于细微处见真实的生活之美。这种生活之美首先体现在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致描摹上,从市井风物到文人雅趣,皆被赋予审美的眼光与诗意的描绘。如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对汴京市井生活的细致刻画,从“州桥夜市”的美食罗列到“相国寺万姓交易”的热闹场景,从“元宵灯会”的璀璨辉煌到“清明踏青”的悠然自得,铺陈出一幅鲜活的都市风情画卷。周密在绘事中,耽美于物,以书籍、法帖、鼎彝为寄托,在细腻描绘中探寻生命意义。他刻画灵璧石小峰“玲珑秀润”,峰顶白石如月,董宗题字“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浑然天成;又称雪白灵璧石“声尤清越”,为稀世之宝;更赞叹天津桥奇石纹路如自然绘就的《华夷图》,“灿然如画”。均在器物之美中照见其对生命的静观与挚爱。

其次,笔记亦注重人情描摹,通过片段轶事勾勒人物神韵,流露对友朋、亲族乃至市井百姓的真诚关切。苏轼《东坡志林》中有“性嗜酒”的异人张憨子,有“未尝怒”的司马光,有“善戏谑”的刘贡父,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友人的思念、对亲人的牵挂、对百姓的同情。欧阳修《归田录》对文人雅士之间交往的记录,展现了朋友之间的志同道合与相互欣赏。《东京梦华录》对市井民众之间互助友爱、和睦相处的描写,体现了宋代社会的淳朴民风。这种对人情世故的温情关照,使宋代笔记充满了人文关怀与生活气息,让读者感受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与温情。

此外,面对仕途浮沉,宋代士人更在笔记中倡导一种于日常中安顿心灵、乐观自适的生活智慧,彰显出宋代文人独特的生活美学。叶梦得致仕之后,寄情山水,回归自然,不为世俗所累,努力营造自己的精神家园,常言“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乐,自不见尔,惟静者乃能得之”。罗大经经历仕途坎坷,主张士大夫应当坦然面对去就,“流行坎止任安排”“击搏豪强,拒绝宦寺,悉无所畏”。倪思同样指出:“闲居事业,与达官无异。观圣贤书,如对君父;观史,如观公案;观小说,如观优伶;观诗,如听歌曲。此其乐,与达者何异?”?笔记中对这种积极乐观、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的倡导,为后世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生活智慧。

(三)考据之美: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

宋代笔记承载了士大夫深厚的学术自觉与理性精神。作者注重对历史事件、典章制度进行严谨考证,补正史之阙,纠流传之误。刘昌诗《芦浦笔记》曰:“惟缮书以自娱。凡先儒之训传,历代之故实,文字之讹舛,地理之迁变,皆得溯其源而循其流。”李心传《旧闻证误》四卷及《补遗》一卷,以考证史实为主,“凡其所见的私史小说,囊括朝廷制度的沿革与改革,岁月的参差变换,名姓的错落,都予以一一详证博引,考辨明晰,以折衷其是非”。沈括《梦溪笔谈》更将考据延伸至自然领域,对天文、物理、工艺等科技现象进行细致观察与记录,体现出可贵的实证态度。此外,对文字音韵、名物典故的精细辨析,亦展现了

宋代笔记融学识于漫笔、寓思辨于闲谈的学术品格。如陆游《老学庵笔记》对古代文字读音、字形演变的考辨,对诗词典故来源的追溯,都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底;洪迈《容斋随笔》对经史子集、诸子百家的考据与评论,涵盖了文字、音韵、训诂、历史、文学等诸多领域,展现了作者广博的学识与严谨的考据精神。

文化自觉:从身份认同到历史传承的精神坚守

在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与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宋代士大夫阶层通过笔记书写,构建起以儒家文化为核心、融合佛道思想的文化认同,坚守文化传统,记录时代风貌,担负起了“以文存史”“以文传心”的文化使命。

文化身份的认同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首要表征。宋代士大夫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形成了独特的士人文化,笔记通过记录士人的交游、雅集、治学、修身等活动,构建起清晰的士人文化身份标识。《归田录》记载了欧阳修晚年退居后的生活,记录其与友人的诗文唱和、书画品鉴、园林游赏,展现了士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生追求与文化品格;《梁溪漫志》记载了宋代士大夫的治学理念与修身方法,强调“为学贵在明理,修身贵在守道”,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融入日常言行,体现了士人对儒家文化身份的深度认同。

历史意识的觉醒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核心体现。笔记作为私家著述,常补正史之缺,以鲜活细节承载历史记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写道:“靖康丙午之明年,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流风,人情和美,但成悵恨。”这种通过文字重建逝去的世界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怀旧,更是在文化断裂的危机中,通过记忆抵抗遗忘的努力。周密在宋亡后所作《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笔记,详细追忆南宋临安的繁华景象,其序言中“时移物换,忧思飘零,追想昔游,殆如梦寐”的感慨,与孟元老遥相呼应。在这些文字中,日常生活的细节——一个节日的习俗、一道菜肴的做法、一处园林的景致,都成为承载文化认同的符号。

时代精神的反思是宋代笔记文化自觉的深层内核。宋代处于内忧外患的时代语境下,士大夫阶层通过笔记书写,反思社会现实、批判政治弊端,坚守精神气节。朱弁《曲洧旧闻》对蔡京等“六贼”的严厉多有揭露,推崇司马光而对王安石不满。《四库全书》由此称其为:“而于王安石之变法,蔡京之绍述,分朋角立之故,言之尤详,盖意在申明北宋一代兴衰治乱之由,深于史事有补,实非小说家流也。”郭东岳《蜀鉴》既详述了蜀地战乱频繁、山河残破、生灵涂炭的局势,又仔细辩证了古今地理的变化,以资为军事借鉴。四库馆臣称“是书所述,皆故守胜败之迹,于军事之得失,地形之险易,恒三致意”。这些文字超越了简单记录,体现了士人“以道自任”的文化担当。

“小道”之中有“大观”,宋代笔记以自由随性的形式,既拓宽了日常审美的宽度,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精神。从审美旨趣而言,宋代笔记在内涵上汲取唐人笔记以史为鉴的讽喻意味,把记录的笔致转向日常当下的琐事,以其深醇的主题意蕴和独特的心境展现,拓展了笔记在表现内容上的宽度和广度,成为中国笔记史上的高标。在文化自觉层面,宋代笔记通过对士人身份的认同、历史传统的传承、时代精神的反思,彰显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成为构建与传承宋代文化体系的关键纽带。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基地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宋代行记的文体形态及其文化意蕴”(22FZW027)阶段性成果】